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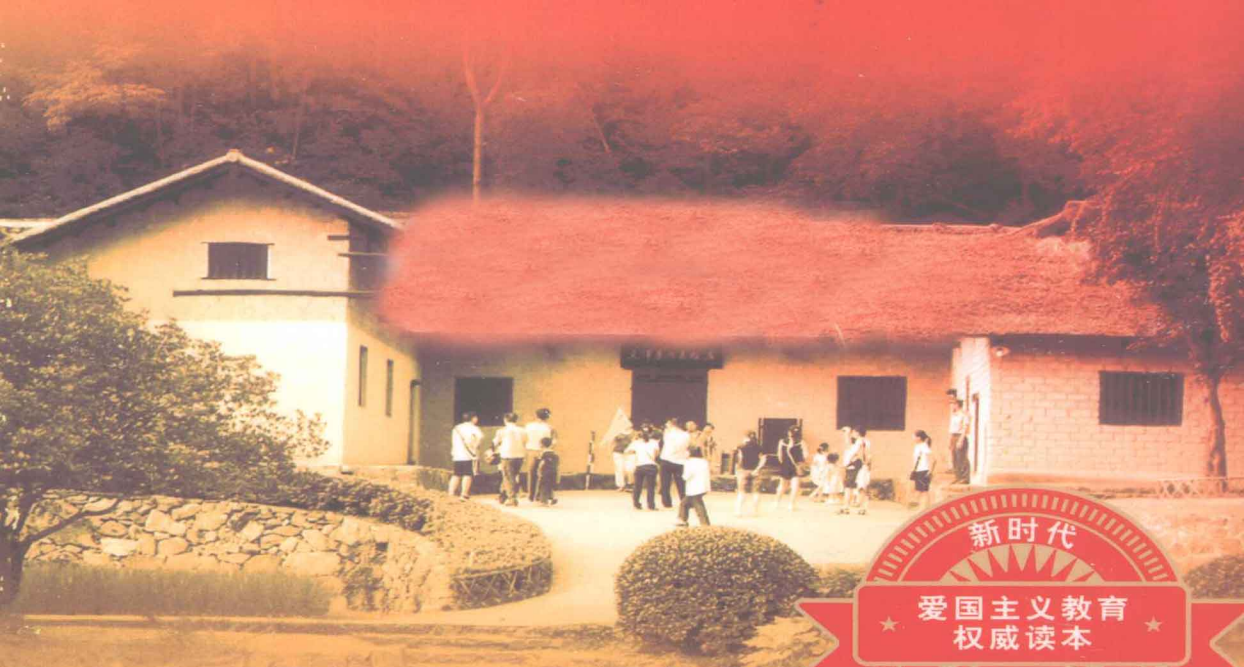
[中宣部首批公布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精选]

革命领袖故居

编◎刘国辉

著◎田余粮 金德华 康必元

张 云 谭利平 胡书伯



新时代

爱国主义教育
权威读本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中宣部首批公布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精选]

革命领袖故居

编◎刘国辉

著◎田余粮 金德华 康必元

张 云 谭利平 胡书伯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领袖故居 / 《中宣部首批公布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精选》编委会编写.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0. 1
(中宣部首批公布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精选)
ISBN 978-7-81126-185-1
I. ①革… II. ①中… III. ①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领袖—故居—中国—青少年读物 IV. ①K878.2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5365号

革命领袖故居

编 者: 刘国辉

责任编辑: 陈 艺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62千字

版 次: 2010年5月 第2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185-1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违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8292951

培育爱国之情 激发报国之志

——写在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系列丛书出版之际

刘云山

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光辉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1994年8月，党中央批准印发了中宣部拟定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纲要》颁布几年来，爱国主义教育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形成了声势，掀起了高潮，取得了显著成效。知我中华、爱我中华、兴我中华，已成为亿万人民的自觉行动。

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为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不懈努力的过程中，在经济体制发生根本转变、人们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爱国主义教育在振奋民族精神、凝聚人民力量，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要求，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认认真真地加以落实。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采用生动活泼的形式，使爱国主义精神潜移默化，入脑入心。实践证明，组织各种活动特别是利用各类博物馆、纪念馆、纪念建筑物以及其他历史遗址、遗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继推出百部爱国主义影片、百种爱国主义图书后，经过郑重遴选，在喜迎香港回归祖国之际，中宣部又公布了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以此影响和带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入开展。

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上下五千年，浓缩了中华民族古老而又年轻的灿烂文明；纵横遍神州，展开了一幅华夏儿女奋发进取的壮丽画卷。一桩桩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一个个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在中华儿女心中树起了一座座不可磨灭的精神丰碑。

——从河姆渡到黄帝陵，从莫高窟盛唐遗韵到八达岭巍巍长城，这类以古代史实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基地告诉人们，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开垦神州亘古荒原，创立了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为整个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鸦片战争博物馆、中英《南京条约》签约旧址、圆明园遗址、林则徐纪念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这类以近代史实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基地，记录着中华民族遭受外敌入侵的屈辱，也记载着中国人民追求自由，不畏强暴，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英勇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井冈山革命纪念地、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地，这类以现代革命斗争史实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基地，书写着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使人们能从中领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

——雷锋纪念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孔繁森纪念馆、林州红旗渠，这类以新中国当代史实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基地，向人们展示了在共和国轰轰烈烈的创业史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一大批模范人物爱国爱民、真诚奉献的英雄风采，让人们深深感受和体会到：只有艰苦创业、团结拼搏，才能使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断走向富强。

凡此种种，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以丰富的史实直观地告诉人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代代相传。中国人民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和保卫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我们高尚的民族精神、珍贵的民族财富，也是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力量源泉。

发挥示范基地作用，需要基地搞好自身建设，认真做好工作。被确定为示范基地的单位，要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加强队伍培训，提高职工的思想业务素质。要精心设计、精心安排、精心组织展出内容，做到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有机统一。要以改革的精神开拓进取，不断提高工作水平。要注意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主动为社会各界尤其是中小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方便和服务。

发挥示范基地作用，需要不断总结工作经验，用好示范基地。要注意总结好的经验，推广好的做法，以点带面，促进工作。基层单位特别是各类学校，要积极利用示范基地开展教育，把有关的历史事件、英烈事迹、传统美德贯穿到思想教育和课堂教学中去，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



目 录

第一章 毛泽东故居韶山纪念馆

毛泽东，中国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2)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概况	(33)
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	(40)
馆藏珍贵文物	(45)
韶山风物耐人思	(73)

第二章 周恩来故居纪念馆

江淮明珠出英才	(86)
大鸾腾飞翱广宇	(92)
人民总理爱人民	(116)
巍巍丰碑奠英灵	(120)
革命文物照千秋	(131)
妙手文章著韶华	(145)

第三章 邓小平故居纪念馆

闪光足迹	(154)
地灵人杰	(162)
普通民居	(168)
故乡情深	(174)
历史作证	(180)

第四章 刘少奇故居纪念馆

为了缔造一个新中国	(190)
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	(201)
为了建设一个好的党	(215)

目 录





共和国主席的风采 (220)

历史巨人的一座丰碑——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简介 (234)

馆藏文物介绍 (244)

第五章 朱德故居纪念馆

琳琅巍峨 (253)

家乡履痕 (255)

碑矗故园 (258)

基地建设 (267)

大海歌唱 (272)

目
录



第一章

毛泽东故居韶山纪念馆

毛泽东,中国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概况

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

馆藏珍贵文物

韶山风物耐人思





毛泽东，中国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自古英雄出少年

聪颖的私塾生

8岁以前的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在湘乡唐家坵（ào）外婆家度过。他的八舅文玉钦在家设有蒙馆，课读乡间子弟。毛泽东在跟随旁听的过程中，背熟了一些简单的课文，还能脱手写字，深得八舅的欢心。

1902年初，毛泽东刚满8岁，回到韶山冲读书，取了个学名叫“詠芝”。他最先就读于南岸私塾，启蒙老师邹春培。在邹春培先生引导下，毛泽东始读《三字经》，继而读《孟子》、《论语》。

毛泽东读书聪明，邹先生很器重他。但毛泽东“性不好束缚”，对体罚很反感。1903年某天，邹先生对学生进行体罚，泽东十分气恼，背起书包就往外走。但又怕父亲打骂，便朝着想像中的县城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家里的人找到了。泽东这才知道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但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回家之后情形有些改善，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这次“罢课”的胜利，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04年秋，毛泽东转学于韶山关公桥私塾，塾师毛詠薰。毛詠薰（1870～1937）于古今史事记之最详，善作联语，学问高压群伦，为人孤傲。毛泽东在其门下读书半年。

1905年春到1906年夏，他在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读书，塾师周少希。据当年同学贺福祥回忆，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不仅能背，还能默写出来。在学习时从不到别人桌上去看，不东逛西走。放了学，在回家的路上，有的同学喜欢抢头，他却一步一步地慢慢走，显得文质彬彬，十多岁就有大人风度（1960年4月《韶山老人座谈会纪要》）。在这两处，他继续攻读四书、五经，虽然塾师不讲经义，仍然要他死记硬背，但他对书中的内容，还是能领悟不少。在这个时期，他开始致力于书法，初学欧阳询、钱南园，后改学兰亭体。这为他后来兼采各家笔法，尤得益于怀素狂草，打下了基础。

1906年秋，转学韶山井湾里私塾，塾师毛字居。此地离家较远，故寄宿就读。据同学刘授洪、郭梓材等回忆，毛泽东读书时，“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老师出‘破题文章’要大家作，他作的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常帮别人作。”他对人有礼貌，从来不欺侮弱小贫穷的同学，却喜欢打抱不平，与逞强的富家子弟作对。有一次轮到他帮同学蒸中饭时，他把一坨锅底烟灰放在一个富





家子弟的饭中。这个孩子吃饭时发现了烟灰，就大哭大闹，不愿意吃饭，引起老师来追问。这时，毛泽东理直气壮地站起来，承认这是他放的。老师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这个人平日不爱惜粮食，吃饭时搞得满地都是，吃不了的也不肯分给别人吃，也要让他饿一餐，看看是什么滋味，使他得到点教训。”毛泽东常对人说的一句话就是：“逢恶就莫怕，逢善就莫欺。”（1960年4月《韶山老人座谈会纪要》）。

毛宇居（1881~1964），亦作蕊珠、禹居，派名泽启，字先甲，别号守一子。他的父亲毛福生是国子监监生。毛宇居幼承家学，饱读诗书，尤工诗对。光绪年间，在家乡设馆授徒。毛宇居虽然只比毛泽东大12岁，又是毛泽东的族兄，但作为先生，对毛泽东要求非常严格，与其他学生没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对私塾的陈规陋习和古板的教学方法十分不满。一天，毛宇居要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在屋里看书，不准出去。哪知毛宇居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到房屋后山上去了。他一边背书，一边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书包。回到课堂，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也孝敬先生一份。毛宇居却不领情，他呵斥毛泽东说：“谁叫你到处乱跑的？”毛泽东毫无惧色地回敬道：“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记硬背也是空的。”

“你竟敢顶撞我，放肆！”毛宇居把桌子一拍，脸胀得通红。毛泽东说：“那你叫我背书好了。”毛宇居知道用背书的方法是难不倒毛泽东的，便心生一计，来到院子中央，指着天井说：“我要你赞井。”毛泽东沿井走了两圈，有如曹植七步吟诗那样脱口而出：“天井四方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同学们听了齐声叫好，毛宇居也暗自称奇，短短几句诗，念起来平自如话，但寓意深刻，他既佩服毛泽东的才气，又不能不对自己的教学方法有所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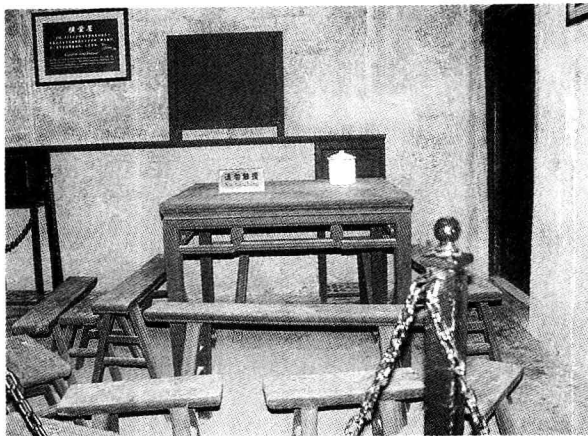
据毛宇居回忆，毛泽东在他门下读的是《公羊春秋》和《左传》等经史书籍。《左传》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它多用事实解释《春秋》，与《公羊传》完全用义理解的有异，加之文字优美，记事详明，因此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和文学名著。毛泽东读史的兴趣便是由《左传》引发的，而且与日俱增，至老不衰。通过读史，毛泽东熟悉了如《曹刿论战》等不少战史战例，为后来研究兵家韬略，积累了一些思想资料。

1906年，毛泽东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1909年，他说服父亲之后，又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为时一年。

毛泽东在乌龟井读书时的老师为毛简臣，（1848~1925）。毛简臣，派名恩谔，字羽仪，为毛泽东的堂叔祖父。毛简臣的父亲毛祖南为著名乡村儒医。受父亲影响，毛简臣自幼熟读经史。青年时代，毛简臣曾入左宗棠所部湘军从戎。回到家乡后，生活十分拮据。为维持生计，便开办私塾，课读乡间子弟。毛简臣对学生训诲有方，毛泽东学习刻苦，深得毛简臣喜爱，师生情谊甚笃。1925年，毛泽东和杨开慧曾看望病重的老师，毛简臣病逝后，并帮助办理丧事。

毛泽东在东茅塘私塾读书的老师是毛麓钟。毛麓钟（1864~1921），学名绍





芳，字麓钟，派名贻训，号云阁。其祖父毛兰芳是以诗书振家声的著名地方大绅。毛麓钟在其祖父毛兰芳的鞭策和训诲下，学绩超群，对于“各经史无不揣摩纯熟，诗赋尤极典丽，每试辄冠其曹。”1892年中秀才。据韶山老人说，别人拿了他的诗赋也曾被录取。毛麓钟为做一番事业，曾雄心勃勃，初应江南提督沈茂胜之聘，游幕江南，以其文才襄办军务，后走武陵为何参军梅岭之书记。回乡后产生过闭门隐居的思想，别号“韶山小隐人”。

1909年，毛麓钟为满足韶山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子弟入学，在东茅塘的面山楼办起了有名的私塾班，接收毛泽东、刘伯庚等十多位青年入学。以毛麓钟的声望和学识办学，确实是难得的求学机会，所以毛泽东非常珍惜。据毛麓钟的儿子毛泽普回忆，毛泽东在班上表现突出，他悟性好，记忆力超人，诗文常得到老师的好评。毛麓钟特别喜欢毛泽东，除耐心地给他点读《史记》、《纲鉴类纂》和《日知录》外，还点读了历代著名的诗、词、歌、赋，甚至还单独给毛泽东上课。

《史记》、《纲鉴类纂》和《日知录》三本书对毛泽东影响深远。毛泽东后来在《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后人认为，司马迁得山川浩瀚之气，故发而为文，气象峥嵘，雄沉万古。司马迁的道德文章，行谊风范，都使毛泽东深为倾服。毛泽东终身喜游历，遍览祖国名山大川，又凡山奔海立，云起沙行，种种奇崛险怪之美，无不领略殆尽，遣于笔端，这便是受了司马迁的影响。

《纲鉴类纂》是明人王世贞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而编写的一种通史课本，与袁黄编写的《纲鉴》齐名。这本书使毛泽东对中国历朝史事，有了一个大致轮廓式的了解，为他后来通读二十四史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力作。顾炎武有感于明末学人枯坐谈禅，空究心性的流弊，提倡“经世致用”，使学问有益于国计民生。毛麓钟之所以悉心给毛泽东讲解《日知录》，是因为“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他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激起了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使命感。他时常对人讲述：“旷观宇宙，鉴尽天地，前因后果，无一可恃，而可恃者惟在我；横尽山川，古往今来，无一可恋，而可恋者惟在目前。”目前之事为何？即美雨欧风向我神州冲激，惟有迎头赶上，才能自树立于世界之林。他希望学生追踪顾炎武，关心目前时局，讲求实学，将学问引向事业之途。后来，毛泽东讲“闭门求学，其

芳，字麓钟，派名贻训，号云阁。其祖父毛兰芳是以诗书振家声的著名地方大绅。毛麓钟在其祖父毛兰芳的鞭策和训诲下，学绩超群，对于“各经史无不揣摩纯熟，诗赋尤极典丽，每试辄冠其曹。”1892年中秀才。据韶山老人说，别人拿了他的诗赋也曾被录取。毛麓钟为做一番事业，曾雄心勃勃，初应江南提督沈茂胜之聘，游幕江南，以其文才襄办军务，后走武陵为何参军梅岭之书记。回乡后产生过闭门隐居的思想，别号“韶山小隐人”。





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等，便与顾炎武形成前后呼应。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毛泽东6岁便开始家务劳动，特别是在13岁到15岁两年辍(chuò)学期间，他整天在地里和长工一起劳动。他的劳动包括两个方面：家务劳动——扫地、放牛、打柴、拾粪、种菜、挑水、喂猪、碓谷、舂米等；田间劳动有犁田、耙田、插秧、踩田、拾禾等。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一心想振兴家业，他十分勤劳，而且对家人也要求严格，看不得人闲着，是个严厉的监工。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毛泽东从小很勤快。禾苗中耕锄草，人家一两遍，他两三遍，并且见草就扯。他在屋后山坡下开辟了一块菜地，种出各种各样的蔬菜。他喂牛时，经常用铁篦子给牛梳身，使牛毛里不藏虱子。牛栏和猪栏被他打扫得很清洁。他家喂的牛和猪极少害病。

少年毛泽东劳动很踏实，有始有终。一天，父亲叫他和弟弟去收拖泥豆。弟弟耍机灵，选豆子长得稀的地方收，不一会，便收了一大片。而毛泽东却选了一块豆子长得密的地方，老老实实在地收着。父亲来了，随便一看，就赞弟弟收的快，责备毛泽东收的慢。但毛泽东并不忙着说明，只是示意比较他和弟弟所收豆子的数量多少。结果，父亲不说话了。

毛泽东13岁到15岁停学在家，整天劳动，学习扶犁、掌耙、抛粮、下种的全套功夫，并总是抢重活干。有一次，他跟长工毛春成一起去推土车子，推得和毛春成的速度差不多。但由于力气不够，下坡的时候却翻了车。他爬起来又装满一车，继续往前推。毛春成见此，一再劝止，他都不听，由此可见毛泽东不认输的倔强个性。

毛泽东出身农家，来自社会的底层。少年时代的劳动锻炼使他较早认识到“成事”与艰苦辛劳之间的关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问耕耘，哪有收获？及年龄渐长，毛泽东将少年时代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断定“怠惰者，生之坟墓”。又说：“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藪(sǒu)。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yù，卖)，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藪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5页）。在组织新民学会时，他特意把“不懒惰”与“不虚伪”、“不赌博”、“不浪费”、“不狎妓”并列写进会员必须遵守的会章。“天道酬勤，习劳神钦”，毛泽东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理解其中的真谛。

青年毛泽东是一介书生，但他绝不是那种文弱的书生。在他看来，“文弱者多，国用不振”，“国之卫也，非强悍有力者不胜其任”（《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5页），而医文弱最有效者，莫过于体力劳动和体魄活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虽然不再参加生产性的体力劳动，但他想尽一切办法强筋健骨，磨砺意志。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一个人纵有满腹经纶，如身体孱弱，力不胜烦，则很难成大





事，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毛泽东深深懂得，心力与体力，两者缺一不可，“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38页）。

在看重体力劳动和体力活动这一点上，无论就其思想特征还是理论倾向而言，毛泽东与许多人包括谭嗣同在内都有重要区别。谭嗣同虽然也重体魄，有武艺，“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骤”，但在思想和理论上，与中国儒学传统的哲学家基本一样，并没有把这放在重要位置上。而对毛泽东来说，体力劳动和体魄活动在其人生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它们是生命奋进的原动力，是抵抗和战胜外在束缚的条件，还是人生快乐和审美享受的源泉。毛泽东把体力劳动和体魄活动当作不可缺少的生存需要，以致使他具有不从事体力活动即极不愉快的身心感觉。这一点值得重视。毛泽东青年时代坚持游泳至老不变的著名事迹，就不仅是自觉磨炼体力、意志的问题，而且还要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战胜自我，战胜自然的心理满足。由此，他把体力的抒发，意志的实现，人生的真谛，审美的快乐融为一体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就不只是读书人一般的豪言壮语，漂亮文辞，而是具有体力活动的实在根基，凝聚着意志成果和审美愉快的思想表达和自我志向。

这是毛泽东的思想、性格与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有显著区别的一点。毛泽东使物质性的运动、斗争成了他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

为穷苦人鸣不平

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外患与内乱相寻。腐朽的封建统治不仅导致了国家权利的丧失，还引发了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和其他阶层的暴动。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的湖南，一直是各种政治力量激烈搏斗的重要地区之一。从广西出发的太平军在湖南几进几出，点燃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烈火，镇压太平军的湘军裁撤后，大量兵勇流入社会，成为无业游民。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湖南成为秘密结社最盛的地方，会党变成了反清斗争的一支巨大力量。在会党中，哥老会影响最大，先后有曾广八、赖荣甫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发动的起义，彭四铁匠、向荫和在湘潭发动的起义等。19世纪末，哥老会追随维新运动，唐才常于1900年领导的自立军运动，就是以湖南、湖北两地的哥老会为主力的。1904年，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以刘揆一任总指挥，洪江会著名领袖马福益为副总指挥。次年，马福益再次企图举事失败，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1906年，哥老会又在革命党人的策划和支持下，发动震惊全国的萍浏醴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先后失败，但却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唤醒了广大人民。

这一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影响最深的，还是长沙的饥民暴动。

1909年，湖南水旱灾频发，粮食奇缺，灾民遍野。而那些豪门富户、投机商人和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谷米，牟取暴利，仅劣绅叶德辉就囤谷万担以上，致使米价暴涨，每斤由26文，猛涨至80文，且一日数价，有竟日携钱而无处





购米者。1910年4月间，长沙南门外有个靠卖水为生的黄贵荪，好不容易攒了80文钱，叫妻子去买一升米。店主因买主钱中杂有不通行的钱币数文，拒不卖米。傍晚，她向邻居借换了几文通行币，再去米店时，米价又涨了，仍然空手而归。她悲愤已极，跳江自尽。黄贵荪闻讯，悲痛万分，拉着饥饿不堪的孩子，一并投塘而死。这一悲剧在长沙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第二天，长沙南门外又发生了碓坊主挑剔大钱，抬高米价的事件，愤怒的居民忍无可忍，聚集起来捣毁了碓坊，随即包围了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平粜。巡抚岑春煊非但不准，且下令枪击请愿群众。13日，又逮捕暴动首领刘永福，从而激起饥民更大骚动。万余人于一夜之间，将城厢内外各碓房堆栈之米，抢劫一空，警兵站岗之木棚，打毁净尽。

正当岑春煊陷于困境之时，湖南布政使庄庚良在长沙四大豪绅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人支持下暗中倒岑。他们唆使一班喽罗在群众中宣扬庄庚良是“庄青天”，高唱“逐瘟官，迎青天”的口号。由于饥民暴动得到豪绅们的呼应，到14日，便发展到全城罢市，蜂涌般的居民焚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大清银行、税关和官钱局。帝国主义列强在长沙的领事馆、洋行、教堂，也多被捣毁和焚烧。清政府大为恐慌，急忙从湖北调来步兵两标进行弹压，并请美、英、日、法、德五国远道从厦门、上海、汉口等地调集十余艘兵舰驶往长沙。这时，利用居民暴动捞到“署理巡抚”一职的庄庚良，终于撕破了“青天”的面具，露出狰狞的本相，大开杀戒。几天之内，暴动者的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死者的头颅被悬挂在街头的旗杆上示众。

长沙的饥民暴动时，毛泽东正在韶山东茅塘面山楼私塾跟随毛麓钟先生读书。一天，他和同学们在学堂外边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便问他们为什么离开长沙，他们说城里闹了大乱子，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饥民暴动的经过。这件事在毛泽东所在学堂里议论了许多天，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以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而感兴趣。而毛泽东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他说：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并承认长沙饥民暴动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西行漫记》第110~111页）。

长沙饥民暴动虽被镇压，但暴动的余波仍然冲击着湖南各地。几乎在同一时候，韶山冲发生了粮荒，村民们采取了平粜阻禁和“吃大户”的行动。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跟随其他富户，趁粮食吃紧的机会，悄悄地运米到城里高价出卖，被贫苦农民中途截留，毛顺生气恼非常，但毛泽东并不同情父亲。只是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不大对头。

少年毛泽东支持穷苦人民起来造反的故事，也有不少。

当时，韶山有个叫毛承文的农民，敢于与地主豪绅对抗。于是地主与封建族长勾结，给毛承文扣上“破坏族规”罪名，押进祠堂，准备毒打、沉潭。毛泽东闻讯，和贫苦农民一起冲进祠堂，向族长进行说理斗争，迫使族长释放了





毛承文。

在长沙饥民暴动前后，毛泽东听到了“彭铁匠”造反的故事。彭铁匠是湘潭哥老会的一个首领。起因是哥老会里的人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这个地主到衙门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钱有势，所以很容易胜诉。哥老会里的人败诉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并建立了一个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义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铁匠被逼逃走，后来终于被捕斩首。少年毛泽东对这件事记忆深刻，他同情这次起义，并认为彭铁匠“是一个英雄”。少年毛泽东本爱读《水浒传》那样反映“官逼民反”的古典小说，但那些英雄的形象毕竟是遥远和经过文人们加工的，当现实的、身边的一桩桩“官逼民反”的事件发生时，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就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形成了同态对应关系，更加速了毛泽东的价值认同和自我角色转换的过程。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追述的：“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西行漫记》第111页）。

从长沙的饥民暴动，到韶山出现的风波，无不强烈震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灵。下层老百姓的忍无可忍和屡扑屡起，使他朦胧地感觉到社会存在着贫富贵贱的尖锐对立。他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并滋生出把他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愿望。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同情劳动人民的感情，正是推动毛泽东走出家园，继续求学并最终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力。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毛泽东幼年在私塾里熟读四书五经，走的虽然是和旧时读书人相似的道路，但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打碎了士子们把科举考试当作进身之阶的梦想。这个巨大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毛泽东的阅读兴趣和价值观念。他越来越重视“杂学”和“新学”，期望从中获得有用的知识。1906年到1909年，毛泽东停学在家，白天参加田间劳动，晚上则挑灯夜读，如饥似渴地阅读除经书以外，就他当时的条件能找到的一些书籍。随着阅读范围的不断扩大，毛泽东的思想也飞驰得越来越远，并经常为天下国家大事劳思忧心。

在夜读中，毛泽东读到了从唐家坨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的两本新书，即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两本书，大大开拓了毛泽东的视野。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书，对清王朝在列强侵略面前的腐败无能和顽固守旧进行了大胆的抨击，指出当时的中国是“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他大声疾呼：“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在经济方面，冯桂芬主张发展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政治方面主张汰冗员，省则例，扩大地方士绅参与政治的权利；在文化上，冯桂芬要求奖励学习资本主义的语言文字，历





算之学与格致之理，废除八股取士制度，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冯桂芬在书中动情地写道：“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夫人而已。”这段话激起了少年毛泽东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泱泱大国何以受制于小夷的问题，从此时常萦绕在他的脑际。

冯桂芬在思想上承龚自珍、魏源等开明思想家的余绪，下开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改良派思想的先河。虽然他的思想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显得落后了，但对身居韶山的毛泽东来说还是挺新鲜的。《校邠庐抗议》一书，称得上是毛泽东了解西方文化的启蒙读物之一。

当然，最能扣动少年毛泽东心弦的还是清末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买办出身，后在洋务企业任会办、总办，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有过从关系。他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由于目击时艰，于1862年写成《救世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为《盛世危言》，辗转翻刻达10余万部。

郑观应通过中西对比，确认中国正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奇局，国势危殆，变法刻不容缓，“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谏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他一方面怒斥顽固派的盲目排外是食古不化，颞颥（hān）昏庸，另一方面对洋务派只效法西方的坚船利炮也深为不满，力主在学习西方器物文化的同时，兼采其制度文化，认为在学习西方器物之时不辅以政治制度的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郑观应对西方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十分羡慕，他指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人心；欲得人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吾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要不要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的国家制度，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郑观应援引史实说，英国行之于前，明效大验；日本步趋于后，勃然而兴。“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可不可亟行哉？噫！慎（diān）矣。”

与洋务派的另一区别是，郑观应还提出了求富在求强之先的观点，即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以兵战治标，商战治本，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抵制侵略，挽回利权。郑观应论证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蔽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而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郑观应对时局的分析以及力挽颓势的办法深深吸引了少年毛泽东。他后来





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盛世危言》这本书，说：“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又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开始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盛世危言》所宣扬的改良主张，在 20 世纪初年已逐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所代替，但对于僻处山村的毛泽东来说，还觉得相当新鲜，特别是其中宣扬的君主立宪、君民共主的思想为毛泽东后来崇拜康有为、梁启超，信奉政治改良主义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还“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1936 年他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描述了日本侵占朝鲜、台湾的经过及法、英侵占越南、缅甸的情况，悲愤之情跃然纸上，他“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韶山有一位“激进派”教师李漱清，常给韶山人讲述自己在各地的见闻，特别是有关维新运动的感人故事。他还主张反佛灭神，废庙兴学。守旧的人纷纷站出来指责他，甚至加以诽谤，而毛泽东却钦佩他的胆识和才学，屡次登门谈心求教，两人形成了一种介乎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

“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正是在时势的推涌下，毛泽东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他意识到，世界正在急剧地变化着，国家和民族处在存亡绝续的关头，稍有心知血性者莫不忧心如焚，慨然奋起。他再也不愿株守家园，浑浑噩噩（è）地过日子了，而是决意走出乡关，去领略和参与这场规模空前的社会大变革。

走出韶山

1910 年夏天，毛泽东正在韶山东茅塘毛麓钟门下读书。由于大闹祠堂“闯了祸”，本来就不乐意儿子上学的毛顺生，正好找了个理由执意要毛泽东退学。之后，毛顺生决定送毛泽东到自己族兄毛槐林在湘潭城开设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掌握经商的本领。起初毛泽东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因为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去过湘潭，听说湘潭是一个大商埠，湘江岸边，店铺鳞次栉比，商贾南来北往，热闹非凡，他巴不得离开对自己管束甚严的父亲，到外边去自由地生活，并增长些见识。

但毛泽东并没有兴奋多久。他骨子里最期望的还是继续求学。与读书相比，当米店学徒实在是退而求其次了，他差点要对父亲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就在毛泽东为前程问题颇感苦闷的时候，他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即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于是决定不顾父亲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他的一个

